

# 西安市外来人口的居住空间隔离研究

景晓芬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农村社会研究中心, 陕西 杨凌 712100)

**摘要:**通过2010年和2000年普查数据分析了西安市外来人口空间分布状况,发现从2000年到2010年西安市呈现中心区域外来人口的聚集度下降、外围区域聚集度上升的特点;而空间隔离程度变化不大;又通过实地调查数据分析了影响外来人口与城市居民空间隔离的因素,发现对外来人口居住空间隔离有影响的因素为个体的留城意愿、居住稳定性、所在社区的性质和所在区域。

**关键词:**外来人口;居住空间;隔离

中图分类号:C9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672(2014)01-0120-05 收稿日期:2013-06-2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项目:空间隔离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研究(12XJC840004)。

作者简介:景晓芬,女,山西运城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村社会研究中心讲师,研究方向:城市社会学、人口社会学。

## 一、研究背景

在社会流动背景下,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外来人口在城市中工作生活的过程既是其逐渐市民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对具有社会意义的城市空间的分配、消费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外来人口在城市空间的分配、消费过程中所处的状况如何,不仅关系到他们能否真正融入城市,而且也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

在对外来人口城市空间研究的相关成果中,空间隔离是一个重要的视角,芝加哥学派人类生态学提出的城市空间隔离的三种模式:同心圈模式、扇形模式和多核心模式,他们认为是共生和竞争这两个因素导致了城市空间隔离的形成;空间经济学则更强调空间隔离过程中地租的作用;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认为空间形成的过程负载了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新韦伯主义者研究了城市空间分配过程中“经理人”的作用及利用住房状况来划分阶级。在具体研究方面,主要有(1)种族隔离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美国,由于种族隔离带来了居住空间上的隔离,尤其是对黑人的隔离,如种族人口居住隔离的状况、居住隔离的规模、居住隔离如何导致下层阶级的产生,以及种族隔离与犯罪的关系,种族隔离与种族融合等(Massey, Denton, Karen Umemoto, 2000)。(2)隔离指标及测量,如Massey和Denton提出的五因素测量法,并有学者利用这套指标对美国的城市隔离状况进行了测

量。(3)欧洲的居住隔离研究,欧洲不像美国存在严重的种族隔离,这些国家居住隔离研究主要集中于因为贫困或政府的住宅政策引起的隔离。

国内关于空间隔离的研究成果比较多,常见的表述如“居住分异”、“空间隔离”、“社会极化”等。如:郑静、许学强等(1995)通过对广州城市空间的研究,认为城市经济发展政策、历史因素、城市规划、住房制度、自然因素等是影响社会空间结构的主要因素;吴启焰(2001)研究了社会空间分异,他认为居住空间分异是社会阶层分化、住房市场空间分化与个人择居行为交互作用的结果;黄怡(2006)以上海为例,分析了上海城市居住隔离的特征,概括归纳了居住隔离的模式与进程,并从住房制度、土地供应、住宅市场、城市历史等方面深入剖析了居住隔离的内在动因;李强(2010)通过对一个新建社区进行研究,认为房地产市场化所引起的居住分异会导致居民之间社会距离的扩大;谭日辉(2010)利用CGSS(2006)的数据进行分析,认为空间隔离是人们主动选择的结果,隔离会导致人际关系的淡漠和人际关系满意度下降;吴庆华(2008)认为空间隔离形成的原因有市场经济因素、住房政策与制度、城市土地供应制度、个人选择四个方面。

以上的这些研究都集中于城市空间本身或城市居民的空间隔离,这些研究并没有考虑到外来人口在城市空间中的分布情况,近些年,随着对外来人口尤其是农民工问题研究的日渐深入,也有一些学者

将空间隔离视角应用于外来人口研究：卢国显(2011)认为,空间隔离导致了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社会距离拉大,这种隔离一方面为农民工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不利于社会稳定;李志刚、刘晔(2011)从社会网络的角度分析了城市新移民聚居区的分异程度,认为新移民与城市居民的分异度正在逐渐降低,但移民与城市居民的隔阂依然存在,二者的融合还需要一个过程;甘满堂(2008)通过对福州的调查,发现在城市改造过程中,农民工面临着从城中村向城郊村的迁移,这种迁移使得农民工居住边缘化和空间隔离愈加严重;雷敏等(2007)认为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之间存在的居住差异与居住隔离是造成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困难的重要原因;俞路、赵永全(2007)提出了人口空间隔离测量的几个指标,并运用这几个指标对上海外来人口的隔离状况进行了测量;段成荣、王莹(2006)利用北京市1997年外来人口普查数据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构造了流动人口居住隔离指数,指出城市流动人口与市民在居住地分布上存在着较高度度的隔离情况。

西安作为西北地区的一个重要大城市,是一个区域性的外来人口聚居地,其外来人口与城市居民的空间隔离状况如何?造成这种隔离的影响因素有哪些?为了了解这一问题,本研究将利用西安市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从宏观层面分析西安市外来人口与城市居民的空间隔离程度,同时利用实际调查数据,从微观层面分析影响外来人口空间隔离的具体因素。

## 二、2000年到2010年西安市外来人口的空间隔离

### (一)西安市外来人口的基本情况

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看,西安市外来人口呈现如下几个特征:

第一,来源特征。从外来人口的来源来看,以省内流入为主,省内流入西安市的人口为67.47万人,省外流入的为58.55万人,在省外流入中,以河南为最多,其次为四川、甘肃、湖北、山西,均为陕西周边省份。作为西北地区的一个城市,西安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区域劳动力市场而非全国劳动力市场,外来人口以省内和中西部与陕西接壤省份为主。

第二,性别特征。在性别构成上,男性占52.9%,女性占47.1%,外来人口男性占多数,但二者比例相差不大。分区来看,以商业服务业为主的城内三区,性别构成比较平衡,而外三区,男性比例较高,可能

与这些区域分布了较多的第二产业或建筑业有关。

第三,文化教育特征。在教育程度构成中,未上过学的占0.8%,小学占8.4%,初中占29.9%,高中占25.4%,大学专科占18.9%,大学本科占15.0%,研究生学历占1.6%。以初中学历为最多,其次为高中,二者合计占到所有外来人口的55.3%,超过一半。

第四,职业构成。从有职业的外来人口的职业构成来看,外来人口从业最多的是商业服务业,占50.7%,其次为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占18.7%,第三位是专业技术人员,占15.9%,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占8.8%,党政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占5.3%,农林牧渔占0.4%。

### (二)西安市外来人口的聚集与隔离

#### 1.西安市外来人口的聚集状况

区位商是地理经济学中的一个指标,它原本是用来测量某个行业在区域中的专业化程度,可以借用它来测量外来人口的空间聚集程度。区位商的计算公式为: $Q_i=(w_i/t_i)/(W/T)$ 。其中 $Q_i$ 为区域 $i$ 的区位商, $w_i$ 为区域 $i$ 的外来人口数量, $t_i$ 为区域 $i$ 的所有人口数量, $W$ 为区域内所有外来人口数, $T$ 为区域内所有人口数,它表示的是区域 $i$ 中外来人口的比重与所有外来人口比重的比例, $Q$ 大于1,说明区域 $i$ 中外来人口所占的比重高于整个区域中外来人口的比重, $Q$ 越大,说明外来人口在区域 $i$ 的集中越高,反之,则说明外来人口的集中度越低。经过计算,以区为分析单元,2000年和2010年西安市六城区的外来人口区位商如下:

表1 2000年和2010年西安六城区外来人口区位商

区域	2000年	2010年	区域	2000年	2010年
新城区	0.84	0.74	未央区	1.08	1.63
碑林区	0.94	0.80	灞桥区	0.74	0.54
莲湖区	0.70	0.90	雁塔区	1.51	1.29

数据来源:根据2000年和2010年西安市人口普查数据计算。

可以看出,2000年的时候,雁塔区和未央区的外来人口聚集程度是比较高的,其区位商分别为1.51和1.08,高于全市的平均水平,其中外来人口高度聚集区为雁塔区,外来人口聚集程度较低的是莲湖区和灞桥区,区位商分别为0.70和0.74。到了2010年,外来人口的聚集区域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未央区的区位商变为最大,其值为1.63,成为外来人口聚集程度最高的区域,灞桥区的集中程度为最低。其余各区除了莲湖区外来人口集中程度提高外,均呈下降趋势。

## 2. 西安市外来人口的隔离状况

表示隔离状况常用的指标是邓肯隔离指数, 隔离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D = \frac{1}{2} \left( \sum_{i=1}^n \left| \frac{w_i - c_i}{w - c} \right| \right)$$

其中  $D$  为隔离指数, 代表外来人口和本地居民的不平均分布程度, 它的值表示多少比例的外来人口需要改变他们的居住地才能够使得区域中的外来人口和本地居民达到平均分布,  $D$  的取值在 0 和 1 之间, 也可以用百分比来表示, 其中 0 表示没有隔离, 即外来人口和城市居民完全平均分布于城市空间, 1 表示完全隔离, 即外来人口和城市居民处于完全不同的区域, 没有任何交叉。  $w_i$  为某区域  $i$  中的外来人口数量,  $W$  为所有外来人口数量,  $c_i$  为区域  $i$  中城市居民数量,  $C$  为所有城市居民数量,  $n$  为区域数量。

经过计算(见表 2), 2000 年以区县为计算单元的西安市外来人口隔离指数为 26.6%, 以街道为计算单元的西安市外来人口隔离指数为 34.9%, 说明计算单元越小, 隔离程度越高, 也就是说隔离更多地发生在较小的单元内, 以区县和乡镇街道这两个单元计算的空间隔离指数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将这一数据与吴晓用 2000 年上海市普查数据计算的上海市外来人口隔离指数(市区以区县为计算单元的隔离指数为 20.9%, 以街道为计算单元隔离指数为 31.7%)相比, 西安市外来人口与城市居民无论在行政区层面上还是在街道层面, 隔离程度都比上海要更高。2010 年西安市以区为计算单元的外来人口与城市居民隔离指数为 26.9%, 与 2000 年相比稍高一些, 但总体差别不大。由于缺乏 2010 年街道层面的外来人口数据, 无法计算以街道为单元的全市外来人口隔离指数。

表 2 2000 年和 2010 年西安市外来人口隔离指数

分析单元	2000		2010	
	行政区	街道	行政区	街道
隔离指数	26.6	34.9	26.9	—

资料来源: 根据 2000 年和 2010 年西安市人口普查数据计算。

为了更详细地了解不同行政区之间外来人口空间隔离的程度差异, 本文还计算了以街道为单元的西安市各区外来人口隔离指数, 2000 年西安各行政区外来人口隔离指数分别为: 新城 0.33, 碑林 0.47, 莲湖 0.35, 未央 0.37, 灞桥 0.32, 雁塔 0.28, 从数据可以看出, 碑林区的外来人口隔离程度最高, 雁塔区最低。在国外衡量种族隔离时, 一般将隔离指数在 60% 以上为高度隔离(李华, 2002)<sup>[14]</sup>, 以

这个数据来衡量, 西安市外来人口的空间隔离程度并不算很高。但值得注意的是, 我们不能简单用国外种族隔离的指标值来衡量外来人口, 毕竟, 我国外来人口进入城市是一个同种族、同文化内部的人口流动, 如果也是 60% 作为高度隔离标准的话, 有可能会给我们的政策制定或解决外来人口在城市中的各方面问题造成很大误导。

## 三、西安市外来人口空间隔离的影响因素

### (一) 数据来源及基本变量说明

以下数据来源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西部项目“空间隔离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课题组 2012 年 6 月到 7 月在西安市做的调查。在西安市城六区(新城、碑林、莲湖、雁塔、未央、灞桥)共发放外来人口问卷 550 份, 其中回收有效问卷 499 份, 有效率 90.7%。西安市民问卷 400 份, 其中回收有效问卷 364 份, 有效率为 91%。样本基本情况如下表:

表 3 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外来人口 (频数)	外来人口 (百分比)	城市居民 (频数)	城市居民 (百分比)
性别	男	271	54.3	153	42.03
	女	228	45.7	211	57.97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55	11.02	9	2.49
	初中	142	28.46	61	16.85
	高中(中专技校)	130	26.05	102	28.18
	大专及以上	172	34.47	190	52.48
年龄	25 岁以下	195	39.08	82	22.53
	26-40 岁	206	41.28	162	44.51
	41-55 岁	83	16.63	86	23.63
	56 岁以上	15	3.01	34	9.33
婚姻状况	未婚	213	42.77	115	31.59
	已婚	279	56.03	234	64.29
	离异	4	0.80	7	1.92
	丧偶	2	0.40	8	2.20

从以上外来人口与城市居民的基本情况可以看出, 在教育程度上, 外来人口的教育程度要明显低于城市居民, 在低水平的教育层次上, 外来人口的比例要高于城市居民, 外来人口的小学教育程度占样本的 11.02%, 而城市居民这一比为 2.49%, 在初中水平的教育程度上, 外来人口比例为 28.46%, 而城市居民为 16.85%, 而在高水平的教育层次上, 外来人口的比例却要低于城市居民, 如大专教育水平, 外来人口比例为 34.47%, 而城市居民为 52.48%。从年龄构成看, 外来人口的年龄结构比城市居民要年轻, 40 岁以下的外来人口占样本的 80.36%, 而城市居民这一比例为 67.04%, 这说明来城市务工的大都是一些年轻人。因为外来人口的年龄构成比城市居民年轻,

与人口年龄结构相关,外来人口的未婚者比例要高于城市居民,外来人口未婚者占样本的42.77%,而城市居民未婚者的比例为31.59%。外来人口和城市居民的个体特征对他们的空间使用或利用情况可能会存在影响。

## (二)主要变量

为了在微观层面上了解影响外来人口空间隔离的因素,以下将利用实地调查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对此问题进行分析。模型中的因变量为农民工和城市居民的空间隔离,在测量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空间隔离时,考虑到基于农民工立场和城市居民立场所体验或感受到的隔离程度可能会存在差异,本文从两个方面都进行了测量,测量用的指标为其中一个群体居住地周围另一群体的数量,结果如下表所示,可以看出,站在城市居民角度,农民工与城市居民这两个群体的空间隔离程度要高于从外来人口角度的空间隔离,在城市居民所居地外来人口“少于一半”和“几乎没有”的比例为45.5%,而在外来人口所住区位,城市居民“少于一半”或“几乎没有”的比例为27.8%,这说明城市居民所居住部分空间是较为封闭的,外来人口很少进入或无法进入。

纳入模型中的因变量为外来人口角度居住空间隔离,用外来人口居住地城市居民的数量多少来衡量,取值分别为“几乎全是”“多于一半”“大概一半”“少于一半”“几乎没有”,将这五个等级分别赋值为1、2、3、4、5。

表4 外来人口与城市居民视角的空间隔离

	外来人口		城市居民	
	频次	有效百分比	频次	有效百分比
几乎全是	85	17.3	15	4.2
多于一半	153	31.1	90	25.3
大概一半	117	23.8	89	25.0
少于一半	97	19.7	116	32.6
几乎没有	40	8.1	46	12.9
Total	492	100.0	356	100.0

在自变量的选择上,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和作者的分析判断,将可能影响外来人口空间隔离的因素分为四类: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生命周期、个人的留城意愿和城市外部环境。

## (三)外来人口空间隔离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从表5可以看出,对外来人口空间隔离有影响的因素为个人留城意愿、社区性质、居住稳定性和所在区域。具体来说,留城意愿越高的外来人口,其与城市居民的空间隔离程度越低;与普通商品房小区

相比,居住在城市村庄类型社区中的外来人口其空间隔离程度明显要高;外来人口在城市中居住场所越不稳定,与城市居民的空间隔离程度越高;处于城市不同区域的外来人口与城市居民的隔离程度存在显著差别,相对于城市中心区(新城区、莲湖区、碑林区),城市外围区外来人口与城市居民的空间隔离程度要低。

从表5还可看出,以往研究中影响居民城市空间分布的两个重要因素: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生命周期对外来人口与城市居民的空间隔离并无显著影响。

表5 空间隔离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自变量	模型
个人特征及社会经济地位	代际(1980年以后出生=1)	0.323(0.92)
	性别	0.247(0.93)
	教育程度(以小学以下为参照)	
	初中	-0.175(-0.39)
	高中(中专或技校)	0.0558(0.12)
	大专及以上	-0.748(-1.45)
生命周期(以未婚为参照)	收入对数	0.261(1.05)
	务工时间	-0.0288(-1.22)
	已婚配偶未随迁	0.179(0.40)
留城意愿	配偶随迁	0.490(1.52)
	已婚且子女随迁到西安	-0.0426(-0.09)
	留城意愿	-0.667*(-2.50)
外部环境	社区类型(以普通商品房小区为参照)	
	老城区	0.952(1.80)
	单位社区	0.606(0.95)
	城市村庄社区	1.207**(2.67)
	住房性质(有产权=1)	-0.0555(-0.09)
	居住稳定性	0.149**(2.73)
所在区(中心城区=1)	-0.711*(-2.23)	
_cons		-2.916(-1.47)
N		383
调整后的R <sup>2</sup>		0.1579

注:\*\*\*、\*\*、\*分别代表在1%、5%和10%水平下显著(双尾检验),括号中为标准误。

## 四、结论和政策启示

在现有的关于空间隔离的研究中,人文地理学多集中在整个城市空间分异上,社会学中关于外来人口或农民工的研究中,很多人注意到了外来人口在城市中的居住问题,其中有一部分包含了居住空间隔离,但关于造成外来人口空间隔离的原因,大多数分析都是从制度等宏观层面进行分析,外来人口个体层面的微观因素很少有人进行考察,本文从实证调查数据出发,通过对西安市外来人口居住空间隔离状况及影响因素的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从宏观层面的数据看,从2000年到2010年,西安市外来人口的聚集区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

变化,呈现中心城区聚集度下降,外围城区聚集度上升的趋势。但从外来人口与城市居民的隔离状况来讲,在行政区单元上的变化程度并不明显。从隔离特征看,呈现出小居住单元上的隔离,即在街道一级的隔离程度高于行政区一级。

第二,在外来人口和城市居民角度,二者的隔离程度是不同的,存在着一定的不对称性,从城市居民角度看,空间隔离程度更高一些,也就是说,在城市居民居住的有些社区,外来人口是无法进入或是被限制进入的,这类社区主要是单位社区和高档社区。

第三,相对于留城意愿低的外来人口,留城意愿高的外来人口与城市居民的空间隔离程度要低,并且存在显著差异。留城意愿是外来人口基于主观意愿和客观现实综合后所做的判定,那些具有强烈留城意愿的人,一般个人或家庭实力较高,他们已经不仅仅是将城市当作一个赚钱的场所,而是希望从社会关系或身份认同层面融入城市,在居住空间上,他们更多地选择与城市居民混合的空间进行居住。

第四,与普通商品房小区相比,居住在城市村庄中(包括城中村、城郊村和城中村改造小区)的外来人口与城市居民的空间隔离程度更高,且存在显著差异,这个结果与以往研究结论相一致,城市村庄社区的居民以外来人口为主,与本地居民呈“倒挂”现象,这也是外来人口与城市居民空间隔离的主要区域所在。

第五,居住越不稳定的外来人口,在居住空间上与城市居民的隔离程度越高,调查数据显示,以农民工为主的外来人口在城市中的空间变动呈现出“职业事件”特征,他们在城市中的平均搬家次数为4.21次,搬家的主要原因是工作变动,但这种职业变动往往是一种低层次的水平变动,并不能使外来人口实现职业地位的上升,其与城市居民的居住空间表现出流动性隔离的特点。

第六,从区域看,居住在城郊三区空间隔离程度要低于老城区,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由于老城区区域狭窄、人口密度较大,对外来人口的容纳空间有限,这些区域以城市本地居民为主;相对而言,郊区发展空间较大,城市新增人口一般都集中于新兴区域,在这些区域,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在大的地域单元上呈混居状态。

第七,传统关于城市空间的研究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生命周期是影响人们的居住空间选择的重要因素,但本研究发现,这两个因素对外来人口城

市空间隔离并无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我国城市中的外来人口还是一个相对较为同质的群体,其分化程度还不是很明显。从收入水平看,外来人口的月平均收入为2533.56元,其众值和中位数均为2000元,这表明外来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人收入水平较低,其收入的微小差异不足以对其择居行为造成影响;关于家庭生命周期对择居行为的影响,一般研究认为,在无子女时,家庭一般会选择城市中心进行居住,有了子女后,家庭一般会由中心城区迁往城郊,在本研究中,根据外来人口的特征,将其家庭生命周期分为未婚、已婚配偶未随迁、已婚且配偶随迁、已婚子女随迁四种情形,回归分析后发现,生命周期对其空间隔离程度无显著影响,外来人口的家庭经济状况及生命周期对空间隔离无显著影响表明自主性因素在外来人口空间选择过程中的作用并不明显,他们的居住状况及与城市居民的居住隔离更多的是受到客观因素的限制。

居住空间是个体和家庭综合经济社会地位一种体现,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社会分层的意义,外来人口与城市居民之间居住空间隔离的长期存在将会导致因身份不同而产生的阶层化,并且形成基于居住空间的阶层间相互封闭,这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和社会稳定都会造成一定影响,要解决外来人口的居住空间隔离问题,必须要着眼于造成外来人口整体弱势的根本原因,即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城市住房政策、教育、福利保障等各项制度,将包括外来人口在内的常住人口作为城市政府进行城市规划和城市空间分配的出发点。✱

#### 参考文献:

- [1]Laumann and House. 转引自王兴中. 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0.
- [2]郑静, 许学强. 广州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因子生态再分析[J]. 地理研究, 1995(2).
- [3]吴启焰. 大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研究的理论与实践[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1.
- [4]黄怡. 城市社会分层与居住隔离[M].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6.
- [5]李强, 李洋. 居住分异与社会距离[J]. 北京社会科学, 2010(1).
- [6]谭日辉. 社会空间分化对城市居民人际关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J]. 天府新论, 2010(2).
- [7]吴庆华. 转型期我国城市空间隔离探析[J]. 齐鲁学刊, 2008(6).
- [8]卢国显. 空间隔离与集中化生存方式: 城市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距离研究[J].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11(3).
- [9]李志刚, 刘晔. 中国城市“新移民”社会网络与空间分异[J]. 地理学报, 2011(6).
- [10]甘露堂, 王岩. 农民工居住边缘化与空间隔离——从城中村到城郊村[J]. 福建论坛, 2008(1).
- [11]雷敏, 张子珩等. 流动人口居住状态与社会融合[J]. 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7(4).
- [12]俞路, 赵永全. 人口分布、隔离指数及其地理视角[J]. 市场与人口分析, 2007(3).
- [13]段成荣, 王莹. 流动人口的居住问题[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06(6).
- [14]李华. 美国的居住隔离[J]. 城市问题, 2002(5).

(下转 128 页)